

「書」與「不書」之間：王靜芝先生文史翰墨 因緣及其首刊文稿的發現

周志煌*

摘要

近代學者王靜芝（1916-2002）先生，精於詩文書畫，其治學鎔鑄文、史，與當年北平輔仁大學的受學背景及師長的學術風格有相當大的關聯。靜芝先生早年關於家庭背景、成學過程及人事閱歷之撰述，或於「書」與「不書」之間，有其隱曲及道德評判。另一方面，其強調為文必須熟於誦讀，「因聲求氣」，而此「氣」不僅關乎文氣，也與民族氣節、文化傳統相互輝映。其間所呈現的人文關懷不僅出乎外侮、內亂等時代之感受，也與民國以來文學教育及史學氛圍等有所接榫，其中鉤合關聯如何，實值得進一步爬梳探究。

關鍵詞：王靜芝、柴青峰、誦讀、因聲求氣、桐城派、宋學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To Write Or Not To Write: Wang Jingzhi's Literary and Scholarly Trajectory and the Found First Issue

Chou Chih-Huang*

Abstract

Wang Jingzhi, a modern scholar of poetry and painting, combines literature and history approaches in his research. His academic training background and style is considerably relevant to Peking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school teachers by then. In Wang's early career the compilation of a learning process and experience of the personnel, between to write or not to write, it has the hidden words and moral judgment. On one hand, Wang emphasized the needs of recite books aloud; on the other, spirit is not only about being owlish. Wang embraced both nation integrity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His humanity attitude is presented in his feelings of foreign aggression, civil strife era, and the joints of the literature education atmospheres of the Republic. It is thus worthy to study further about how his work and life trajectory hooks together.

Keywords: WangJingzhi, Chai Qingfeng, Recite,Sounds of Air, TongCheng School, Song Xue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書」與「不書」之間：王靜芝先生文史翰墨 因緣及其首刊文稿的發現

周志煌

一、引言：往事並不如煙

在中興大學校園的步道景觀之中，其中「孔學要旨石碑」，分別由四位當代書法名家揮毫題寫「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是中興大學重要的校景地標之一。其中「游於藝」一句為王靜芝（1916-2002）先生所書，旁落款提及時年八十七，題寫未久靜芝先生就溘然長逝，可謂晚年最後墨寶之一。身為王靜芝先生的學生，都有機會親聞其講授《史記》敘史之史筆及史家內心隱曲，靜芝先生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做為輔大中文系系訓及將《史記》列為必修課程，這種對「史」與「文」鎔鑄的重視，與當年北平輔仁大學陳垣（1880-1971）校長、國文系余嘉錫（1884-1955）系主任兩人帶出的學術風格有相當大的關聯。然而就靜芝先生而言，不像民國以來學者，留有日記、書信，可供後人研究其立志成學、交遊閱歷等生平相關資料之運用及參照依據。也因此從其他相關史料及旁證的角度，靜芝先生早年成學歷程仍有許多值得釐清探究之處。

首先，據《北京輔仁大學校史（1925-1952）》所載，靜芝先生為1936級國文學系入學學生，書中記載名字為「王靜芝」，然而校史所載1939年級國文學系的學生，另有「王大安」此一名字，且同級同學尚有「劉迺中、金鳳林、郭崇元、李年生、樂芝田」¹，此處眾多學生學籍資料來自校史檔案，理應無錯置之虞。然

¹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1925-1952）》（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年），頁425、798、799。金鳳林曾在同學分手多年後，感慨寫詩道：「西風黃葉落庭柯，悵望雲山欲放歌。默對殘陽悲往逝，而今故舊已無多。」並將詩歌分贈大學同學王靜芝與劉迺中，而二人也分別和詩以對。靜芝先生和詩：「浮生一夢悟南柯，贏得吟成幾首歌。五十餘年悲路遠，松風明月總情多。」劉迺中先生和詩：「髦年不復夢南柯，緬懷同窗發浩歌。好個秋光著力賞，莫爭來日好還多。」詳參王寶林：〈松風明月

而根據靜芝先生好友劉迺中（1921-2015）先生回憶：

我於 1939 年考入輔仁大學國文系，不久就見到了擔任國文教員的啟先生。……大約從 1939 年秋季開學起，我就邀集了同班嗜書愛畫的同學王大安、金鳳林、郭崇元、李年生、樂芝田等人，再加上不約而同的美術系的梁敬蓮、張瑾、袁小舟、張學禮等，或則數人邀集，或則個人行動，反正啟先生（當時都這樣稱呼，一直延續到現在）家有著無窮的凝聚力。每到星期天，尤其是我和王大安差不多很少缺席，我們向先生請教和談論範圍很廣，大體上以書畫為中心，兼談藝術界和學校瑣事等。²

這裡關於同學情誼的追憶以及敘寫向啓功（1912-2005）老師學習書畫之勤奮，雖事隔多年仍歷歷在目，往事並不如煙。據與靜芝先生及劉迺中先生有書畫因緣，曾於靜芝先生晚年登門探訪的王寶林記載：「一九三八年，劉迺中考入輔仁大學國文系，王大安也放棄了在燕京大學經濟系的學業考入輔仁。當時劉迺中先生正青春年少，而比他長五歲的大安先生已娶妻生子，可入學不久，兩人在對方身上發現了太多的相似之處：王大安喜愛京劇，劉迺中擅拉京胡；劉迺中喜歡書畫，王大安雅好丹青……王大安先生去臺灣前夕，因一次登記人員的失誤，將錯就錯更名為王靜芝。³」換言之，靜芝先生是到臺灣才有的名字，何以《北京輔仁大學校史（1925-1952）》會有王靜芝與王大安兩個名字分屬不同年份入學？根據臺灣輔大《王靜芝著作選集》編輯委員會敘述的〈王靜芝教授年譜略〉：「王靜芝，本名大安，以字行……民國廿六年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民國廿七年重考入輔仁大

² 總情多——懷念臺灣學者書畫家王靜芝教授》，2012 年 9 月 17 日。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312b10102dz9w.html（最後瀏覽日：2016 年 9 月 26 日）。

² 劉迺中：〈回憶啟功先生〉，《中國書法》第 16 期(2015 年)，頁 82-83。劉迺中字漢寬，晚號古柳逸民，1921 年生於北京。幼承家學，楷、篆並習，稍長習隸、行草書，並涉及商周以下甲骨、金石、瓦甓、封泥等。1944 年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書法師事啟功，後又得王福庵指點篆刻。另，劉迺中先生曾於 1992 年來到臺灣，筆者曾親聞其蒞臨輔大文學院之演講。

³ 王寶林：〈藝苑雙峰並立兩岸翰墨奇緣——書法篆刻家劉迺中與臺灣書畫家王靜芝的翰墨奇緣〉，《書法報》「蘭亭版」，2002 年 3 月。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312b10100ejdt.html（最後瀏覽日：2016 年 9 月 26 日）。

學國文系。⁴」靜芝、大安應屬同一人，當無疑義，然《北京輔仁大學校史（1925-1952）》國文學系 1936 級的「王靜芝」是放在最後一個名字（見頁 799），其來由不知為何？「王靜芝」、「王大安」兩個名字分屬不同年份入學，頗耐人尋味？此《校史》頁 425 有靜芝先生 1990 年與啓功先生在香港的合照，頁 426 有王靜芝《啓元詩》詩稿。顯然此校史編撰過程中有得到靜芝先生相關資料（包括使用來臺以後的名字），然而照片上方的校友介紹都寫王靜芝是「1936 級國文學系」（頁 425），另外，此校友介紹只寫靜芝先生為 1916 年生，但未寫卒年，顯然 2005 年出版此《校史》在介紹靜芝先生資料時，未注意靜芝先生已於 2002 年仙逝，只寫生年未寫卒年，亦有不盡周詳之處。

在靜芝先生回憶受學的文章中，曾提到在輔仁大學國文系諸多知名教授開課情形：「……孫楷第先生授中國小說史、趙蔭棠先生授聲韻學、陸穎明先生授文字學。這些位先生，都是一時名士，我們能得親炙受教，實在是幸運。⁵」然查考當時輔仁師友活動，1938 年北平為日軍佔領之淪陷區，沈兼士（1887-1947）、英千里（1900-1969）、董洗凡（1900-1986）等諸位先生不畏艱難成立國民黨外圍地下抗日組織「炎社」，而其他輔仁師友在淪陷區也多有所氣節之表現。然其中身兼聲韻學家及新文藝創作者的趙蔭棠（1893-1970），曾經於北京大學教書，日軍進駐北平後，轉往輔仁大學待了兩年（1937-1939），當日本統治當局於 1939 年重開北京大學後，趙蔭棠又回到北京大學文學院任教授。趙蔭棠如此之經歷若合觀靜芝先生入學時間而言，據校史載，趙蔭棠「聲韻學綱要」一門課開在一年級⁶，1939 級的王大安或有可能短暫時間「親炙受教」，聽過趙蔭棠的課，相對的，1936 級的王靜芝應無緣聽到尚在北京大學任教的趙蔭棠之授課。綜觀相關史料以及靜芝先生的回憶，王大安（來臺後改名王靜芝）與同窗好友劉廸中皆為 1938 年考入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校史將兩人列為 1939 級，或為學制年分），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應無 1936 級王靜芝這一學生（校史刊登 1936 級王靜芝照片為來臺後靜芝先生本尊，顯然應無另一王靜芝才是）。《北京輔仁大學校史（1925-1952）》關於靜芝先生資料記載顯然有所混淆與訛誤，應當予以更正。

⁴ 王靜芝：〈王靜芝教授年譜略〉，《王靜芝教授譜傳別錄》（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33、34。

⁵ 王靜芝：〈綠柳蔭下〉，《王靜芝散文集》（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54。

⁶ 《北京輔仁大學校史（1925-1952）》，頁 113。

二、文與史的交涉：史筆與隱曲

靜芝先生在追述自己於輔大受學時的學習經驗，曾有一段文字說道：

在讀大一時候，大一國文老師是柴青峰先生，他看了我的第一篇作文，說我的文章越作越乾縮，所以不開展。我就問：應怎樣作才能好。柴先生告訴我：作文章要從小處向大處開展，越作越有話說，越議論越見理性。不可越作越小，走進死巷，無話可說，草草終結。我問：如何能作到這樣。柴先生說：多讀古人開展的文章，往復吟誦，熟讀深探，久而自得其法。我立即照方行事，自己找古人佳作往復朗誦，每日大聲讀書兩小時，一個多月，似乎仍未見效，自度時間仍太短，乃繼續不停。某日，讀陳子昂文章，似恍然有所悟，發現作文章原來可以如此滔滔不絕。其後又多讀東坡長文，始體會為文的鋪張揚厲之理，如江河發源由一流而容百川，浩蕩而下，曲折衝激，乃波濤萬狀，奔騰千里。……讀經史子用硃筆點讀，讀詩文高聲朗誦，是我的習慣。而朗讀這一習慣從七歲起就養成了。大學時期，因求文章之開展，朗誦工夫更為增加。⁷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這裡提到的柴青峰先生，即柴德賡（1908-1970），是著名歷史學家，為北平輔仁陳垣校長的得意門生及學術傳人。柴德賡精於目錄學和文獻史料學。他繼承陳垣「學術從目錄學入手」的研究方法，把目錄學作為治史的重要途徑。其教導後學，常叮囑要熟稔張之洞《書目答問》一書，顯然與陳垣治學風尚亦有關係。從柴德賡曾撰述過的〈記貴陽本《書目答問》兼論《答問補正》〉、〈重印《書目答問補正》序〉等文章就可見一斑。《書目答問》不只是當時北平輔仁大學校內文史治學的入門磚，同時也是國文系的主要閱覽書目。輔仁大學國文學系與史學系關係頗為密切，除了校長陳垣、國文系系主任余嘉錫兩位先生都是碩學鴻儒，出入文史，博通經籍以外，兩人也雙雙獲選 1948 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屆人文組院士，為當時全國私立大學之最。靜芝先生曾多次撰文提到余嘉錫主任對其學問的影響，也專文介紹聽余嘉錫授課，在《書目答問》中所得到的受益⁸。由此可以得知，文史知識的

⁷ 王靜芝：〈綠柳蔭下〉，《王靜芝散文集》，頁 254-255。

⁸ 王靜芝：〈時還讀我書——讀書治學經驗談〉，《王靜芝散文集》，頁 32-33。此外〈國

薰陶，在當時北平輔仁國文系學生的人格涵養中，是互為表裡，相得益彰。

柴德賡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自 1936 年起，即在輔仁大學及附中任教。1937 年，抗戰爆發，滯留北平。每日與陳垣閉門讀書，研討學問。曾作《〈鮚埼亭集〉謝三賓考》，借考證斥責漢奸賣國求榮，並於抗戰勝利後獲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最高學術獎勵⁹。相較於靜芝先生另一親炙聽聞教授「聲韻學綱要」的老師趙蔭棠，1944 年被選為日本成立的華北作家協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古典文學部門主任委員。同年又以華北作家協會的代表身份赴南京參加了「第一屆中國文學者年會」與「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倡議「新東亞文化精神」，提出「成立東洋古典文學研究機關」的提案，以呼應日本「大東亞文化」的建設¹⁰。柴德賡、趙蔭棠兩者相較之下，民族氣節之表現顯然立見高下。然這一外敵佔領淪陷區的氣節表現差異，靜芝先生在諸多追憶往事文章中並未有所著墨。相對的，對於後來因國共內戰導致家產被沒收，不得不渡海來臺的靜芝先生，共產黨反倒更為他所痛斥。他曾指出：「柴先生能文能詩，可惜他後來一度親共，一步走錯，最後被共匪鬥爭而死！」¹¹追憶柴先生的〈綠柳蔭下〉一文發表於民國 69 年（1980）1 月 22 日的《中華日報》，兩岸尚在對峙隔絕之中，靜芝先生顯然另有管道得知大陸「鐵幕」狀況，尤其此段涉及文革之經歷，頗有值得玩味之處。以靜芝先生讀書時的輔仁師長來說，1949 年以後多留在大陸，其後在反右及文革運動中遭受批鬥含冤致死的師長所在多有。尤其劉盼遂（1896-1966）於文革爆發初始就被紅衛兵揪鬥溺死，其悲憤之情及遭遇之慘烈更為人所感慨。柴德賡於 1966 年夏，受文

學大師余嘉錫先生〉、〈《書目答問》〉二文，亦多提到在目錄學、史學方面的受益，《王靜芝學術論文集（上）》（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445、471-473。

⁹ 《北京輔仁大學校史（1925-1952）》，頁 774、775。

¹⁰ 趙蔭棠雖靠攏日本當局，然隨戰爭物資缺乏、物價波動，趙蔭棠也不得不割愛其所藏之書，在其所撰〈賣書記〉一文中，就非常傳神的說道：「不料到了去年夏天，物價又比前年加幾倍，於是老同文廿四史便換了棒子麵兒。牠的周圍，也零零碎碎走了許多。今年春天，棒子麵兒漲到四元多了，於是實行打倒英美主義，把先年所存的文學理論及藝術美學之類的二百多種西文書全數賣出去了。」；「我想建設的三傳系統被打破了，說文解字詁林也隨着去了。西文的論文和文學史之類，也被挑出幾種。最驚魄動魂的，是有關於我的本行的幾種：西儒耳目資，我費了許多精神，生了許多氣，才能買到。明板白綿紙古今韻會舉要，是我所最愛的，裏邊夾着一張當死的當票，是買牠的紀念品。被挑出來的書，堆在屋地上一大堆，我不敢正視牠們，爽性跑出去，兩夜沒有回家。」詳見趙蔭棠：〈賣書記〉，《文藝世紀》（冬季號），第 1 卷第 2 期（1945 年 2 月）。

¹¹ 王靜芝：〈綠柳蔭下〉，《王靜芝散文集》，頁 255。

化大革命影響，身心備受摧殘，被迫回江蘇師範學院接受批鬥及勞動。1970年1月23日，在蘇州郊區尹山湖農場勞動時，心臟病突發，救治不及而卒。直至1979年5月，才獲得平反昭雪。然而對比柴先生在1943年底，因反對漢奸曹汝霖任輔仁大學董事長，舉家南遷，離開輔仁大學所展現的知識分子之風骨與氣節¹²。靜芝先生略於「抗日」氣節書寫，反倒對於柴德賡的「投共」及往後的遭遇有更多著墨，對於其1949年以後未能來臺，其間的感慨與不平之鳴，反而可以看出兩人師生情感更為深厚的一面。如果在「投共」之舉上，以此對比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時任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之的一封公開信〉，信中提到：

我現在明白了毛澤東的政治主張和實際情況，我願貢獻你這種版本，校正你孤證偏見的危險……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導師』，你在這是非分明勝敗昭然的時候，竟脫離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團，你為什麼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來呢？我以為你不應當再堅持以前的錯誤成見，應當有敢於否定過去觀點錯誤的勇氣。你應該轉向人民……¹³。

雖然這封公開信是否為陳垣親書頗有爭議，但在政局動盪去取抉擇的歷史分水嶺上，這封信後來被視為是共產黨藉知識分子「批胡、反胡」所開的第一槍，其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對於1949年以後選擇來臺灣的輔仁校友而言，這封擴散效應極強的公開信大家似乎避而不談，回憶陳校長治校，多是正面稱許讚頌，這其中包括靜芝先生在內。北平輔仁大學校友會編有《輔仁往事》數輯，可以看到許多老校友的追憶及對陳垣校長的稱頌。事實上，身處「大江大海」的歷史變局中，後人看待歷史及生命去留之抉擇，固然需多擁有一些「同情的諒解」，然在回憶往昔人事的追述者筆下，「書」與「不書」之間，其春秋史筆也有頗多值得玩味之處，尤其靜芝先生與陳垣校長、柴青峰老師，彼此之間的親疏遠近之別，也顯

¹² 柴德賡離開輔仁後，應李霽野、臺靜農、魏建功之邀，任四川白沙國立四川女子師範學院歷史系副教授兼圖書館長。直到1946年才回北平，任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1950年起接掌系主任。臺靜農先生在北平輔仁及四川白沙女子師範學院之際，與柴德賡多所往來，兩人留有詩作彼此唱和。臺靜農先生來臺後，與靜芝先生交誼深厚，兩人閒談話題之間，應也可看到柴德賡的身影。

¹³ 該信寫於1949年4月29日，現收入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191-195。

示在其筆墨底下所寓託感慨之情的差異。

民國二十年（1931），對於東北的中國居民來說，顯然是一個時代重要的分水嶺。靜芝先生來臺盛年之際，在敘述自己家庭背景時曾說道：「我生在一個書香家庭，父親是公務員，母親作過小學教員。¹⁴」不知是否出於淡泊之胸懷，抑或源於父親過去與張作霖、張學良父子舊識之淵源，都讓靜芝先生對於父親應有之豐碑著墨顯得含蓄保守。張作霖之為「軍閥」，於國民黨掌權，以黨政意識形態主導的「歷史教科書」筆下多所負面評價；另外，張學良在大陸發動西安事變，來臺後仍為高層所軟禁。以上政治顧慮，都有可能讓被稱為「民國奉天政要」的王鏡寰（1884-1935），於次子靜芝先生記錄家庭生活筆下，在來臺初期僅能以「公務員」身分來予以稱謂，且敘寫多所輕描帶過，對父親「功績」多所「不書」，其中隱曲亦值得探尋。¹⁵

靜芝先生父親王鏡寰，字明宇，1884年生於遼寧北鎮。曾任奉天東豐縣知事、奉天官地清丈局總辦、奉海鐵路公司總理、奉天省政務廳廳長，1928年12月，任遼寧省政府委員、奉天交涉總署署長¹⁶，1929年11月兼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員。

¹⁴ 王靜芝：〈我怎樣讀國文〉，《王靜芝散文集》，頁1。

¹⁵ 1934年3月張學良曾擔當蔣介石委任的「鄂豫皖剿匪副司令」，期間曾召見王鏡寰，對其才識大為讚賞，擬予以重用，但王鏡寰因疾遽逝，蔣不得不作罷。當然，如眾所知，蔣介石與張學良1936年因西安事變交惡，身為王鏡寰後人的靜芝先生，對此淵源因有所顧忌。靜芝先生晚年曾有行書〈先君傳畧〉，寫於1994年七十九歲之際，內容對王鏡寰先生一生功績有較完整的交代。1994年當時臺灣政局已愈趨自由民主化，兩岸早已解嚴交流多時，書寫此一傳略時空環境已有所轉變，當無所顧忌，可暢言抒發一己孝思之情。

¹⁶ 王鏡寰在瀋陽事變之前，負責與日人交涉中國東北領土及百姓權益，此處列舉1929年6月27日「神原農場事件」報告說明為例：「查日人神原租種瀋陽郊外北陵附近水田，拖欠租金，延不繳納，經我方聲明撤租，日人狡展拖賴，迄不退地一案，迭經交涉，迄未解決。該地段內築有北寧鐵路岔道一條，迭據日領照會，聲稱該日人等以為此項道岔通過神原農場，侵佔該民權利，或將自由撤去鐵道等語，均經先後嚴駁，並呈報遼寧省政府查核有案……查神原農場一案，幾經交涉，日訪迄惟狡展，不應我方正當主張，茲竟出此無理取鬧舉動，實屬蔑理，蠻橫已極……而敝方於事實上，仍委曲求全，希望全部解決，以了懸案，且一再聲明，並非無解決途徑，今貴國方面不此之圖，不顧歷來經過，不求正當解決，竟出此蠻妄無理行為，該神原等個人無知，不識大體，或不免無理取鬧，而貴方軍警，為貴國國家公人，竟以為顧體現，蔑視邦交，私袒頑民，加入此項無賴行為，實大有損于貴國軍警之令譽，且似此蠻不知理，益足以深滋兩國民間之誤會，本署長至為抱憾。」《神原農場事件：國民政府外交部特派遼寧交涉員王鏡寰報告》，1929年6月27日。參見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58。

九一八瀋陽事變後跟隨張學良到北平，任海陸空副司令部參議，1935年在武漢因病逝世。張學良親往致祭，書贈：「長懷無已」匾額及「棄我忽若遺無路從容陪笑語，看君妙為政感時撫事增惋傷」輓聯。現瀋陽大東區圖書館址，即王鏡寰在奉天任職時的公館，亦是靜芝先生年幼之故居，如今被瀋陽市列為文物保護單位，居瀋陽大東「六大公館」之首。1920年代，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為打破日本壟斷東北鐵路的局面，組織奉天官商合辦股份公司，由中國自主設計、施工，不取外資、不借外辦，完成了奉天至海龍的鐵路建設，即「奉海鐵路」。王鏡寰時任公司總理，成為奉系強盛時東北鐵路第一經理人。¹⁷

王鏡寰後來帶著靜芝先生舉家從瀋陽遷往北平，顯然與九一八瀋陽事變脫離不了關係。1930年代初期，日本在東北發動瀋陽事變、扶植滿洲國的建立，就南京國民政府而言，為取得文化的主導與發言權，在文化、教育政策的制訂上，以及思想整合與控制方面就顯得相對重要。1933年在南京出版的《大道》月刊，其第一卷第二期就有署名『無名子』寫的〈孔教發微〉一文，作者開宗明義提到：「吾人不可不知孔教之數字，乃教育之教，非宗教之教。若泥為宗教之教，則失孔子一生精神志氣面目，可不慎歟？」¹⁸《大道》月刊，民國22年（1933）11月創刊於南京，是在日本佔領東三省的背景下產生的。「大道」之名出於：「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發刊詞提到：「何況二千年前，即有尼山夫子天下為公之遺訓；二千年後，又有中山先生天下為公之實施之今日。」該刊把「提高國際地位，主持人道主義，灌輸國民普通知識，發揚民族固有道德，警醒過去現在深恥大辱，準備現在未來禦侮敵愾」等等時代精神，作為刊物宗旨。在1930年代，孔子之學雖未被主政者以「國教」來看待，然而作為民族文化最具代表的象徵符碼，其被拿來當作貫徹執行「以固有道德為訓」的工具也隨處可見。同樣的，以日本扶植成立的滿洲國發行《興仁季刊》為例，康德二年（1935年）5月及7月發刊的第三、四期，分別有〈康德二年春季上丁祀孔講述詞〉、〈春丁祀孔紀實〉、〈儒書天人之

¹⁷ 高群：〈撫順市檔案局（館）與瀋陽市大東區圖書館互贈民國奉天政要王鏡寰史料〉，《蘭台世界》第22期，2012年8月上旬，頁7。撫順市檔案館在館藏民國檔案中發現王鏡寰有關檔案後，與瀋陽市大東區圖書館就民國奉天政要王鏡寰生平史料開展了交流合作，成立「王鏡寰展室」，除放置王鏡寰任交涉署署長的任命檔案、奉海鐵路公司啟用印章的文件、奉天至撫順鐵路列車開通運行的檔案複製文件之外，大東圖書館並將靜芝先生編輯整理的〈王鏡寰先生哀挽錄〉複製文件贈送給撫順檔案館。

¹⁸ 無名子：〈孔教發微〉，《大道月刊》，1933年第1卷第2期，頁1。

說〉、〈孔子教育學說之評述〉等與儒家相關的文章刊登羅列。而國民黨元老戴季陶主編的《新亞細亞》雜誌，則在同年 1935 年 8 月發刊的第 10 卷第 2 期當中，擺設了孔子專號，按其文章在雜誌中排列順序分別是：孔德成〈先聖事蹟及生卒年月日之考信〉、孔德成〈尊孔史敘〉、盛襄子〈孔門弟子學說考〉、郝之御〈孔子哲學中之姚江學派〉、吳心恒〈孔子年表〉、李源澄〈尊孔論〉、吳心恒〈祀孔考略〉，這樣的排列順序頗有訊息可資解讀。孔德成（1920-2008）先生為孔子第七十七代嫡長孫，襲封三十二代衍聖公，民國 24 年，有感世襲爵位不宜存於民國，孔先生主動請求南京國民政府撤銷「衍聖公」之爵號。國民政府以為道統不可廢，於是改衍聖公為「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成為當時中華民國唯一世襲的特任官。同年 7 月，由陳立夫主持，戴傳賢監督，於南京宣誓就職，獲蔣中正委員長親臨祝賀，同年（1935）稍後並以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之名參加日本孔廟的落成大典。如此背景，加上日本在東北滿洲國祀孔祭典如火如荼的展開，以孔德成先生時年不過十五歲，兩篇專文竟放在南京國民政府主導刊物「論述」之首位，其所提揭的「孔學在中國」之象徵意味，也正足以作為南京國民政府有關文化「正統性」之宣示。

靜芝先生雖在北平求學，然不可能無感於日本在滿洲國的相關作為，尤其日本在滿洲國藉尊孔以籠絡讀書人的手段，反而激化了國民政府重視傳統經籍，推動民族文化教育的決心。當時報刊雜誌作為傳媒的效應，在大學校園內部，自是能夠與外在政治社會思潮及民族情懷相互感應。且靜芝先生在北平輔仁就學期間，日本侵華戰爭已全面展開，北平輔仁文學院在民國二十四年辦學宗旨中即曾註明：「對於中國固有文化之特長，發揮光大，以增長其民族自信力。向之所短，則利用科學，救其弊、補其偏，務使習國學而毋故步自封，讀西籍而毋食歐不化，不託空言，期裨實用，此本院共同一致之所冀圖者也。¹⁹」如此訓誡輔以民族情懷，靜芝先生的求學歷程，在民族文化的感召之下，對於傳統思想及文學，自然不能不有所回應與伸揚。

三、因聲求氣：文氣、氣節與文學教育

¹⁹ 〈文學院沿革及旨趣〉，《北平輔仁大學文學院概況（1935 年度）》，收入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文教・高等教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 年），頁 5-6。

前述靜芝先生提及大一國文誦讀與寫作結合之事，因受柴青峰先生「往復吟誦，熟讀深探，久而自得其法。」之教誨，大學時期，為求文章之開展，其於朗誦工夫更為增加。靜芝先生民國五年生於瀋陽，所謂「朗讀這一習慣從七歲起就養成了²⁰」，大略可以窺見先生從小國文學習，是以基礎訓練及興趣培養為主，靜芝先生說道：

由小學四年到六年畢業之間，國文一課可說只有《古文觀止》一本書，大致由淺入深，由近向古，選擇適合的內容來讀，……我的國文根基實是在小學時期打好的。小時候背誦得快，記憶得牢，……在學童時期就培養出興趣……我讀的高中，國文一科除選讀模範文之外，另有「學術文」和「文學史」，以及「文學概論」。就模範文選讀方面，我們讀到許多《昭明文選》中的名作，我感覺那些文章之美，沁人心脾，比《古文觀止》更合我的口味。²¹



小學到中學時代的靜芝先生，從東北「關外」瀋陽進到「關內」北平，顯然並未受到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強烈衝擊，「選學妖孽、桐城謬種」（錢玄同語）的思想氛圍也並未影響到靜芝先生的國文學習。雖然小時候勤於背誦，然而對於國文學習當中，「誦讀」與「為文」兩事的接榫關聯，靜芝先生顯然尙未能領略二者鉤合之奧妙。

在靜芝先生就讀輔仁大學的三〇年代後期，白話文學推動已經歷十多年的發展，在語文教育上，已經到了需討論語文教育課綱；教材比例多寡；乃至孔孟荀等經、子書籍的閱讀，該擺在哪一求學階段；1934年5月間，汪懋祖、許夢因等人重談「復興文言」的老調，提倡中小學生普遍學習文言，反對白話文；吹捧湖廣軍閥何鍵、陳濟棠主張尊孔讀經，推廣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²²」。新文化運動健將們對這種迷戀古文的論調，給予了嚴厲的批評。《獨立評論》也發表了任叔永的〈為全國小學生請命〉，以及胡適的〈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和〈我

²⁰ 王靜芝：〈綠柳蔭下〉，《王靜芝散文集》，頁255。

²¹ 王靜芝：〈我怎樣讀國文〉，《王靜芝散文集》，頁3-4。

²² 以許夢因為例，其曾發表過〈告白話派青年〉，《時代公論》1934年第3卷第13期；〈孟子倫理學〉，《陝西教育月刊》，1937年第3卷第3期；〈孟子之倫理學(一續)〉，《陝西教育月刊》，1937年第3卷第4期。

們今日還不配讀經〉等幾篇文章。其後又從所謂「中小學文言運動」、「讀經與否」之論爭，轉移到有關「大眾語」的討論。這是有關「文藝大眾化」在語言問題上的討論。人們提倡大眾語，是「為了要糾正白話文學的許多缺點」；要做到「大眾說得出，聽得懂，寫得順手，看得明白」，而且還要成為「大眾高興說，高興聽，高興寫，高興看的語言文字。²³」當然這場論爭也有人借「大眾語」來否定「五四式白話」，要把白話與文言文一起拋棄。

倡議「大眾語」的風尚，並不足以提升一般學生的語文程度。靜芝先生由於從小對於國文興趣的培養及記誦的薰陶，加上初入大學受柴青峰先生「為文之道」的指點，大一即展現過人的才學。1940年4月25日《輔仁生活》第6期有王大安〈惜有限之光陰讀有用之書籍說〉一文之刊載，根據編者案所寫道：「此篇原為國文系一年級國文成績，茲徵得『以文會友』主人同意，選刊於此」。經由這裡的記載，可以看出1939級入學的王大安（靜芝先生），其文筆精妙，大一即展現優於同儕之創作才能。《輔仁生活》雖為校刊，但因是教會所辦學校，內容中英文稿兼收，且為公開販售之刊物，隨物價波動及戰時出刊張數所限，金額或有調整，大抵多以一角販售，且有代售機構。此篇〈惜有限之光陰讀有用之書籍說〉文章應為靜芝先生目前所見最早刊登在報刊雜誌的專文，惜未能為前賢整理出版靜芝先生作品集時所發現，因史料之珍貴，全文照錄如下：

惜有限之光陰讀有用之書籍說 國一王大安

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之生，求無涯之學，雖焚膏繼晷，兀兀窮年，而智海茫茫，淵深難測，安可不博極羣書以展胸懷乎。然自漢興重儒，經學寢廣；魏晉六朝，辭章繁富。降至唐宋明清，代有通儒才士。於是書以時積，文以日增。四庫所存，卷以兆計，四庫所遺，何止萬數。學津之典籍無窮，吾人之光陰有限，罄讀古今之書，既屬不能，且亦不可，以其有宜有不宜也。故每當展卷之時，豈可不擇選而讀乎？若夫春秋微言，潛隱大義；詩書易禮，情理昭然；孟軻好辯，荀卿守

²³ 陳子展：〈文言——白話——大眾語〉；陳望道：〈關於大眾語文學的建設〉；陶知行：〈大眾語文運動之路〉，分別載《申報·自由談》1934年6月18日、19日，7月4日。

正，言成一家，各闡其旨。而馬遷創例，班氏繼軌；陳范以降，凡成正史二十有四，皆能宣明古人之意，以昭鑑後世。韓文公倡導古文，天下靡然，八家之名，流傳不朽。有清以漢學取勝，揚微刻妙，戴段錢王，各有發明。而明遺三儒，大論宏著，効姦譏惡，不稍飾隱。至於桐城方姚，格局嚴緊，汪洪孫孔，揚波扇飄，蓋亦辭義典雅，百代可傳者也。凡此種種，皆言近而興深，語細而旨高，括而言之，有用可讀之書也。至若老莊之道，空洞虛玄；商鞅之法，刻薄少恩。以至陰、陽、縱橫、兵、農、稗官之流，雖各自圓其說，而不足信賴。下至騷人怨靡，楊馬詭麗；宋齊梁陳，大變風雅，率多駢辭儻藻，弄月吟風，其與夫子之道稍遠矣。有明王學大興，非治世之道，馴至亡國喪邦，不亦學之誤耶？凡此種種，雖間有可取，而畢竟有用者少，無用者多；簡冊之間，當置之於次也。至於脞說野史，巷議街談，以及窮鄉僻壤間，偶有人以管窺蠡測之學，著書立說，舉莛扣鐘，陋不自覺，此不過供後人覆瓿之物，統為無用之書而已。然而余嘗觀今之學子。其心或多有異，置有用之書籍於不顧，日從事於浮辭淫藻；捐可貴之光陰而不惜，乃究其荒謬不倫之說，且自以為得計，自居為飽學之士，誠伐本而求木茂者矣。然則為學之道若何？曰惜有限之光陰，讀有用之書籍，擇其宜者而讀之，其不宜者而屏之；其在可否之間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庶幾時光不致虛擲，而得窺學問之堂奧乎。²⁴

此文通篇使用文史掌故，點綴其間，將二千多年學術思想及文學發展脈絡概述綜論，以《莊子·養生主》：「生也有涯，知也無涯」破題開頭，而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收尾，點明時光有限，於書籍閱覽需有所抉擇。文章中文史典籍相關背景的掌握與列舉，顯然與靜芝先生入國文系必須閱覽熟讀《書目答問》的知識訓練有關。而文中特別批評今之學子置有用書籍於不顧，日從事於浮辭淫藻，陋不自覺。在靜芝先生看來，讀書對於義理的掌握，乃至為文著書立說，都與經世有著密切之關聯。清代桐城大家劉大櫆（1698-1779）《論文偶記》曾說道：「蓋人不窮理讀書，則出詞鄙倍空疏。人無經濟，則言雖累牘，不適於用。……故文人

²⁴ 王大安：〈惜有限之光陰讀有用之書籍說〉，《輔仁生活》第6期，1940年4月25日，頁7。

者，大匠也；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²⁵」靜芝先生文章除文意與題目扣合緊湊外，此文遣詞設句也多有所創發，尤其「揚波扇飄」、「舉莛扣鐘」等生動的譬喻，更活絡了論述的效應。另「春秋微言，潛隱大義；詩書易禮，情理昭然；孟軻好辯，荀卿守正，言成一家，各闡其旨」四字排比，文氣通貫酣暢。真正做到了大一國文柴青峰老師的叮囑：「作文章要從小處向大處開展，越作越有話說，越議論越見理性。」而此篇行文能有鋪張揚厲之理，「如江河發源由一流而容百川，浩蕩而下，曲折衝激，乃波濤萬狀，奔騰千里。²⁶」就在於每日持續大聲讀誦的結果。觀此篇大一國文習作，誦讀之於爲文，讀、寫之間豈有所隔？

「因聲求氣」之說古已有之，韓愈、柳宗元、蘇洵等人都曾有所倡議，以清代文論而言，桐城派劉大櫆提出的「因聲求氣」說影響較大，他在《論文偶記》中說道：

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曹子桓、蘇子由論文，以氣為主，是矣。然氣隨神轉，神渾則氣灝，神遠則氣逸，神偉則氣高，神變則氣奇，神深則氣靜，故神為氣之主。……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蓋音節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於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為神氣之跡。……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²⁷

此段引言闡述了「神氣」和「音節」之間的關係。「神氣」是作品體現出來的神韻和氣勢，而「音節」則包括參差錯落、長短相間的句式安排，以及抑揚頓挫、高下緩急等語言音韻方面的內涵。當作者用文辭來表達情意，需要憑藉著說話時的氣勢或語氣等聲情來展示，也因此會有緩急、頓挫、高下、轉折等聲調，鎔鑄在藝術處理手法之中。讀者在誦讀之中，透過對於文章「音節」的揣摩，能夠領會到作品乃至作者的「神氣」，才能達到所謂的「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

²⁵ 劉大櫆：《論文偶記》，收入郭紹虞、羅根澤主編：「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頁3。

²⁶ 王靜芝：〈綠柳蔭下〉。

²⁷ 劉大櫆：《論文偶記》，頁3、6。

神氣出矣」的因聲求氣之效。可以說，「因聲求氣」的具體方法即在於誦讀。劉大櫆曾指出這樣的誦讀之法：

其要只在讀古人文字時，便設以此身代古人說話，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爛熟後，我之神氣即古人之神氣，古人之音節都在我喉吻間，合我喉吻者便是與古人神氣音節相似處，久之自然鏗鏘發金石聲。記得多，便可生情。²⁸

所謂「爛熟」，若依周振甫（1911-2000）的話來說，即：「不光是會讀出文章的聲情來，還要求對古人的意旨有『深切』瞭解。²⁹」而爛熟的誦讀與寫作的關係，包括「把這部書裡的詞彙裝到腦子裡去」；「由於熟讀，接觸這個詞時，不是孤立的，而是連同整個句子一起記熟的」；「當對這個詞完全懂得時，就從這個詞在不同句子裡的意義有一些什麼變化，以及在不同句子裡的不同用法都懂了。³⁰」換言之，因聲求氣正是透過反覆誦讀來學習寫作的一種方法。

曾執教於無錫國專、交通大學、大夏大學等學校，師從清末民初碩儒唐文治（1865-1954）的陳柱（字柱尊，1890-1944），在靜芝先生進入輔仁大學就讀的同時期，於 1940 年發表〈論教授國文宜注重熟讀〉一文，其中特別轉引同為晚清「曾門四弟子」的散文大家張裕釗（1823-1894）寫給桐城大儒吳汝倫（1840-1903）的信，信中內容說道：

夫作者之亡也久矣，而吾欲求至乎其域，則務通乎其微。以其無意為之而莫不至也，故必諷誦之深且久，使吾之與古人訴合於無間，然後能深契自然之妙，而究極其能事。若夫專以深思力索為事者，固時亦可以得其意，然與夫心凝形釋，冥合於言議之表者，則或有間矣。故姚氏與諸家因聲求氣之說，為不可易也。吾所求於古人者，由氣而通其意，以及其辭與法，

²⁸ 劉大櫆：《論文偶記》，頁 12。

²⁹ 周振甫：《文章例話·因聲求氣》，收入《周振甫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年），頁 81。

³⁰ 周振甫：《文章例話·因聲求氣》，頁 81。

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為文，則一以意為主，而辭氣與法胥從之矣。³¹

陳柱為此下個註腳：「張氏此文所謂『因聲以求氣』之聲，即指誦讀而言。其所以謂之『聲』者本於韓昌黎與李翊書云：『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³²」誦讀古文可以瞭解古人寫作時的文氣，並進而能夠「知言」，深切掌握古人寫作時内心的情志。同時，對於現代學子而言，誦讀前賢之作，對於古文寫作能力的提升也有絕大的助益。陳柱指出：

蓋讀時須注意聲音之高下。凡文之起承轉合，抑揚頓挫，與讀時之聲音高下歛侈，遲速剛柔，莫不有關係。欲通乎此，非諷誦之深且久，必不能喻乎其微也。蓋既諷誦之深且久，則吾之腦力氣息，浸淫古今之美文之中，必甚深且久。古人所謂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染之既深且久，則發而為文，有不期而自與古今之美文相合者矣。此正猶粵人生長於粵，所聞無非粵語，有不期而自然粵語者矣。是故專講文法以為文者，勉強門削者也。熟讀多而為文者，自然發洩者也，吾國先哲為文，不講文法學，而專務熟讀者，正所以務為自然之文也。³³

為了讓所謂「自然發洩」的為文之道能夠暢絡，陳柱還提供務實性的作法建議：「欲令其熟讀，不在於多，每週約兩篇，每篇約三四百字足矣。欲驗學生之能熟誦與否，在昔則專重背誦，然每班學生數十人之多，背誦必不易行也；則莫如以默書代之。然亦須間選二三人數背誦行以驗之。蓋默書之熟與背誦之熟終有間也。³⁴」背誦才能感受聲情，進而因聲求文。作為南社成員的陳柱，時人或視之為文化保

³¹ 陳柱尊：〈論教授國文宜注重熟讀〉，《大學季刊》，第1卷第1期（創刊號）（上海：大學季刊社，1940年4月），頁21。此張裕釗〈與吳摯父書〉在周振甫《文章例話·因聲求氣》當中，曾一樣被轉引來加以討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封轉引書信的受信者吳汝倫，為桐城文章大家，曾讓教過靜芝先生《昭明文選》的高步瀛（1873-1940）先生大為折服，「恨不親受業於桐城吳摯父先生，乃即其遺書而私淑之，盡得其傳。」（見尚秉和：〈高闌仙先生傳〉，收入卞孝萱等編：《民國人物碑傳集》，卷十一（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年），頁769）。

³² 陳柱尊：〈論教授國文宜注重熟讀〉，頁21。

³³ 陳柱尊：〈論教授國文宜注重熟讀〉，頁21。

³⁴ 陳柱尊：〈論教授國文宜注重熟讀〉，頁22。

守主義者，其創作意見及文化情感或被視之為舊派文人思維。然而對比所謂「新派文人」，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朱自清（1898-1948）對於「誦讀」的看法與陳柱類似，朱氏一樣提出不論古文或白話文寫作，「誦讀」一事都有助於操筆為文能力的提升。朱自清曾經說道：

所謂古文，本來基於平常說話的調子 雖然因為究竟不是口頭的語言，不妨音樂化的去吟唱，然而受用似乎並不大；倒是誦讀能見出這種古文的本色。所以就是文言，也還該以說話調的誦讀為主。但是誦讀總得多讀熟讀，才有效用！……誦讀不但可以幫助寫，還可以幫助說，而說話也可以幫助寫，可以會寫不會說和會說不會寫的人還是有。這就見得寫和說到底是兩回事了。大概學寫主要得靠誦讀，文言白話都如此；單靠說話學不成文言，也學不好白話。現在許多學生很能說話，卻寫不通白話文，就因為他們誦讀太少，不懂得如何將說話時的聲調等等包含在白話文裡。³⁵

當民初以降，白話文推動已超過三十年的時間，朱自清仍有感於許多人「寫不通白話文」的原因在於「誦讀太少」，因此，在大學語文教育方面，「誦讀」之事顯然是教學刻不容緩之事。在抗戰期間 1940 年 1 月下旬，以朱自清、浦江清（1904-1957）為代表的西南聯大文學院教師就曾創辦《國文月刊》，以促進國文教學，提高青年學子的國文水準。相對的，1940 年代前後位處淪陷區的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為了同學寫給自己的信件訛誤甚多，忍不住說道：「內中文詞，用字、格式，錯誤百出，我真想把它搜集起來，出一本《壞文模範集》」³⁶為了提升大學學生國文水準，陳垣將「國文」規定為學校所有文理科各專業一年級學生共同的必修課，從教材的編選、教師的遴選到結業考試，都由陳垣親自負責，教材《國文讀本》係白文本，即無標點句讀³⁷。所有大一國文授課教師要求學生課

³⁵ 朱自清：〈論誦讀〉，《東南評論》新 1 卷第 7 期（1947 年 4 月），頁 338-339。

³⁶ 趙英：〈「以文會友」——輔大生活雜寫之一〉，《輔仁生活》，1939 年第 1 期。

³⁷ 北平輔仁時期由陳垣校長編選的《國文讀本》，最近（2016 年）由其嫡孫陳智超整理並導讀，北京商務印書館以《大一國文讀本》之名正式出版。該書是由陳垣自選、自編、自校的稿紙鈔本《國文讀本》和各年度《國文讀本》，以及所附《論孟一編》合併而成。《國文讀本》既選取了《春秋》、《左傳》、《史記》、《漢書》等經史名篇，又有韓愈、柳宗元、劉知幾、蘇洵、蘇軾、蘇轍、歸有光、顧炎武等名家的書序、政論文和散文等。《國文讀本》直排不加標點，由讀者自行句讀，對於培養學生

前預習、標點，然後由教師評點、講解，最後由學生背誦並加熟讀。背誦之用意，在陳垣寫給長女桂辛的信件中曾提到：「令學生讀之爛熟，涵泳玩索（每一二句），習慣自然，則出口成文，可免翻譯之苦。……學本國文貴能使言文一致，今以《論》、《孟》為言文一致之標準，選出數十章，熟讀如流，不啻若自其口出，則出筆自易。³⁸」出於對大一國文的重視，陳垣除以校長之尊親自教授外，更是動員文史兩系重要菁英，如臺靜農、周祖謨、劉厚滋、趙玉生、啓功、李維棻、柴德賡、余遜、戴君仁、牟傳楷、牟潤生、趙萬里、褚聖麟、顧隨、劉盼遂、梁啓雄、孫楷第等人都會先後擔任大一國文課的教學任務。靜芝先生大一國文受學於史學系柴德賡先生，以及謹遵「往復吟誦，熟讀深探，久而自得其法」的教誨，其間學習風氣可由校風窺知一二。曾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的來新夏（1923-2014）也回憶當年大一國文課程帶給他深厚的學術影響：

那時輔仁大學對「大一國文」似乎比其他學校重視得多，……一年學下來，確實感受到不少讀古文的樂趣，有些篇章還能朗朗上口。不久，自己說話也能部分出口成章，聽老輩講事也能入耳，自我感覺良好，其中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教材中所附的《論孟一臠》部分。《論孟一臠》是輔仁「大一國文」的特色，為其他大學所編教材所無。它附在其他古文後邊，獨立成篇，另題《論孟一臠》，共選《論語》與《孟子》各 22 章，共 10 頁。……《論孟一臠》雖只四字，但它的內涵卻值得析釋。據說這是陳垣師的命名，……陳師見學生無暇專攻《論》、《孟》，所以特親選 40 餘章，引導學生涉獵，淺嘗一下傳統文化的美味。臠是切割好的小肉片，一臠是老先生從《論》、《孟》經典中摘取一點精華，給後輩嘗嘗甜頭，希望後輩能由此進窺堂奧。³⁹

文中提到《論孟一臠》據說是陳垣的命名，其實宋代張九成（1092-1159）門人郎曄將施德操《孟子發題》附於張九成《橫浦集》之後刊刻。就已用臠肉為喻來稱

的國學素養和古文根基有相當的助益。

³⁸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頁 647。

³⁹ 來新夏：〈說說「大一國文」——兼說《論孟一臠》〉，《人民日報》，2013 年 10 月 5 日。

頌《孟子發題》的成就及在宋代孟學著述當中的重要性。張九成與施德操交遊過從深厚，九成之門人郎曄亦以爲施德操文章學問與老師張九成接近，對施德操《孟子發題》讚譽有加：「生平論纂甚富，里人郎晦之煜偶得其《孟子發題》，輒鋟木以廣其傳，使學者嘗此一巒。亦可以知先生之大略云。⁴⁰」清代桐城派強調「文」「道」合一，其中方苞以六經、論語、孟子爲文章最早的根源，其次爲左傳、史記；其次爲唐宋八大家，最後是明朝的歸有光。《論孟一巒》注入大一國文教學，北平輔仁正位處日寇佔領的淪陷區，在文學與道統的綰合，以及在朗讀中「因聲求氣」的感知體悟中，於民族文化之情感聯繫及浩然正氣之涵養自是不言而喻，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大丈夫氣節自是鎔鑄其中。

除了大一國文課程之外，一九三〇年代的輔仁國文系，全系課程劃分爲「語言文字學」（甲）與「文學」（乙）兩組，學生可以在受教育上有語言文字及文學的偏重，但是，無論是甲組或是乙組的學生，都必須把語言文字的基礎打好。入校後，一年級的必修基礎課相同，如「目錄學」、「文字學綱要」、「聲韻學綱要」、「中國文學史」、「作文」等課，是甲、乙兩組學生都要學習的。

語文程度的低落，不僅讓民國史學「二陳」之一的陳垣有所感慨，「二陳」另一學者陳寅恪（1890-1969），也曾爲此做了「驚人之舉」，1932年8月清華大學及研究所入學考試國文試題爲陳寅恪所出，除作文題〈夢遊清華園記〉外，各年級另有「作對子」題，其中尤以一年級的對子「孫行者」最引人側目，也引來不少討論及節外生枝的風波。清華入學國文命題正值九一八事變發生的第二年，而在1932年1月，日軍侵上海；3月於東北成立滿洲國。當時南京政府欲召開「國難會議」，陳寅恪也爲受邀學者之一，後來雖未赴會，但其治學風尚與民族文化精神之鉤合，是可以窺見的。陳寅恪視學術之獨立是民族精神生死之大事，在作對子試題引起爭議之際，陳寅恪寫給清華國文系代理系主任劉文典（1889-1958）信中，特別說明自己以「對子」爲題的初衷：

真正中國語文文法未成立之前，似無過於對對子之一方法。……凡考試國

⁴⁰ 《宋元學案》卷四十〈橫浦學案〉。另，《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十七「《孟子發題》提要」云：「宋施德操撰。……此書所述孟子七篇之旨，大意謂孟子有大功四：一曰道性善；二曰明浩然之氣；三曰辟楊墨；四曰黜五霸而尊三王。皆聖人心術之要而孟子直指以示人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十二〈書北牕炙輶後〉，亦指出：「彥執嘗著《孟子發題》一篇，子韶之門人郎曄編《橫浦集》附之卷末」。

文，必考其文理之通與否，必以文法為標準，此不待論者。但此事言之甚易，行之則難。最先須問吾輩今日依據何種文法以考試國文。今日印歐語系化之文法，即馬氏文通「格義」式之文法，既不宜施之於不同語系中國語文，而與漢語同系之語言比較研究，又在草昧時期，中國語文真正文法，尚未能成立，此其所以甚難也。⁴¹

在陳寅恪看來，國文試題要「與華夏民族語言文學之特性有密切關係」，才能測驗出程度，而中國語言文學之特性，並不在於像馬建忠（1845-1900）所撰《文通》，參照印歐語法體系及中國虛字所寫的漢語語法書籍那樣，拿外國語法來作為本國語文程度測試之用。在陳寅恪看來，「從事比較語言之學，必具一歷史觀念，而具有歷史觀念者，必不能認賊作父，自亂其宗統也。⁴²」就學術的客觀性而言，陳寅恪有其專業上的糾謬與判斷，在情感上，傳統知識與民族文化內涵，是不容在張冠李戴之下，隨意套用而評判是非優劣。對於馬建忠《文通》一書除了陳寅恪發出「嗚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⁴³」的感慨之外，《文通》對於青年學子習文的殺傷力，在前文所提到的學者陳柱看來，也影響了學生對於背誦古文的興趣：陳柱曾說道：

大約近來教授國文之通病，約有兩種，其一為忽略熟讀，其二為高談創作。後者今且勿論，請論前者。忽略熟讀此實為矯枉過正之弊。蓋科舉時代教授學童，不重講解，只重背誦；而矯其弊者，遂專重講解，又受講授外國文者之影響，崇尚文法學。於是如馬氏文通一類之書，遂風靡一時。而對於背誦一道，遂無人注意，甚者且笑為腐敗教法，深惡而痛絕之矣。

44

這裡特別言及傳統「背誦」被學界視為是腐敗教法，反而像馬氏《文通》這種拿西方語法學套用漢語的文法書，卻被大家奉之為圭臬。也因此導致「背誦一道，

⁴¹ 陳寅恪：〈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金明館叢稿二編》（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頁221。

⁴² 陳寅恪：〈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23。

⁴³ 陳寅恪：〈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23。

⁴⁴ 陳柱尊：〈論教授國文宜注重熟讀〉，《大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40年），頁19。

遂無人注意」的窘境。不同於陳寅恪從「歷史觀念」看待語言比較之問題，陳柱更在乎的是學英文與中文的不同趨向與進路，陳柱特別舉出翻譯大家嚴復（1854-1921）在 1904 年為所作《英文漢詁》一書作序時，曾說明學英文固不能不習「文譜」（文法），然陳柱歸納此〈序〉要點，特別加以引伸發揮說道：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彼文中所謂文譜者，即今日所謂文法學也。然尚云，文譜者講其所以習，非由此而得其所習也」則專恃文法以習英文者，固未為得計也。況國文乎？又云：「誠欲精通英文，則在博學多通，熟之而已。此真閱歷甘苦之言。「博學多通熟之」六字，包括三事。一曰，博學，則多讀是也。二曰多通，則精思是也。三曰熟之，則熟讀是也。又曰：使徒執是編以為己足，是無異鈔食單而以為果腹，誦書譜而遂廢臨池，斯無望已。」斯語對於今日教授國文之弊，專重講解，重文法，而廢熟讀者，可謂深切著明之至。夫徒看食單而不能果腹，徒閱書譜不能工書，人人皆知之，奈何欲徒講文法而遂欲通文理乎？學英文不能，學國文更不能，吾敢斷言之矣。⁴⁵

陳柱此文在 1940 年所寫，雖晚於 1932 年陳寅恪「對對子」所引來之風波。然而兩人對於當時受西方語言學影響，流行之風所及「講文法而不通文理」的現象，都不約而同都發出醒鐘之音。也因此，陳寅恪認為「真正中國文法未成立前之暫時代用品，此方法即為對對子。所對不逾十字，已能表現中國語文特性之多方面。其中有與高中卒業應備之國文常識相關者，亦有漢語漢文特殊優點之所在，可藉以測驗高材及專攻吾國文學之人，即投考國文學系者。⁴⁶」陳寅恪列舉了作「對子」的四項優點，其中特別重視作對子能分辨平仄聲這一功用，且認為這是高中畢業生就應該擁有的常識。陳氏說道：

凡中國之韻文詩賦詞曲無論矣，即美術性之散文，亦必有適當之聲調。若讀者不能分平仄，則不能完全欣賞與瞭解，竟與不讀相去無幾，遑論仿作與轉譯。又中國古文之句讀，多依聲調而決定。印歐語系之標點法，不盡能施用於中國古文。若讀者不道平仄聲調，則不知其文句起迄。故讀古

⁴⁵ 陳柱尊：〈論教授國文宜注重熟讀〉，頁 20。

⁴⁶ 陳寅恪：〈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24。

書，往往誤解。⁴⁷

換言之，聲調之著重為漢字書寫文章之特色，這裡雖提到古文閱讀不知平仄聲調所可能產生對於古書的誤解，然陳寅恪所關心的，並非文言、白話，乃至大眾語之爭等屬於語言形式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承載千年文化的古代文學作品，如何能讓學子從中瞭解民族文化之精神，尤其在此國難外侮、形勢險峻之際。陳寅恪在稍早 1931 年 5 月另外一文〈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當中也說道：

今日國雖倖存，而國史已失其正統，若起先民於地下，其感慨如何？今日與支那語同系諸語言，猶無精密之調查研究，故難以測定國語之地位，及辨別其源流，治國語學者又多無暇為歷史之探討，及方言之調查，論其現狀，似尚注重宣傳方面。國文則全國大學所研究者，皆不求通解及剖析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內容，為一種人文主義之教育，雖有賢者，勢不能不以創造文學為旨歸。⁴⁸

國文教育與史學精神的融通，由此亦可見一斑。陳寅恪在〈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中，開頭即曾說道：「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民初新史學風尚以宋代史學為宗，陳垣、柴德賡師徒二人治史皆曾著力於宋代史學，諸如司馬光《資治通鑑》、歐陽修《新五代史》等，師徒二人皆有著述加以闡發。而清代桐城派治文辭，於學術宗尚方面以宋學為尊。晚清以降在文學與史學的交涉上，學者文人或出入於宋元之際史學；或倡議宋學義理；或以宋詩為本進行創作，這些學者文人彼此往來密切。如吳汝綸（1840-1903）、沈曾植（1850-1922）、陳三立（1853-1937）、嚴復（1854-1921）等，且多與今文經世致用學者有所交誼。民國以來，陳垣、陳寅恪等史學大家亦為宋學擁戴者，並自詡所治史學為「新宋學」。陳寅恪就曾說道：

吾國近年之學術，如考古歷史文藝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蕩及外緣薰習之

⁴⁷ 陳寅恪：〈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25。

⁴⁸ 陳寅恪：〈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清華大學二十週年紀念特刊》（北京：清華大學，1931 年 5 月），頁 1。見《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362。

故，咸有顯著之變遷。將來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斷論。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學術之復興，或新宋學之建立是已。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⁴⁹

若從學術史脈絡來觀察文學觀念的發展，清代桐城文論以「道統自任」，與漢學家名物訓詁治學風尚相互爭鋒，清代漢宋之爭是一學術課題，而民國以來新文學運動將桐城古文視之為『謬種』，胡適（1891-1962）、錢玄同（1887-1939）等新文學健將在倡議白話文學之際，於史學方面也加入疑古行列。對這些鼓吹白話文及疑古史學者而言，他們是要藉助「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以重估一切價值來看待傳統國學。而清儒戴震（1724-1777）所代表的漢學考據工夫，正是運用了「科學的方法」，為胡適等人所推崇。相較於這些推崇清代考據的新文化運動人士，民國初年學術殿堂上，另有推崇宋學的陳垣、陳寅恪等學者，其視史學為民族文化的載體，對他們而言，新史學即是「新宋學」，而新史學（新宋學）的登場及走向中心，也展現了清代考據經學（漢學）趨於「邊緣化」的可能⁵⁰。此外，宋代史學在異族（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強權環伺之下，民族精神及春秋大義等表現於著史之中，尤為宋代史學正統論之一大特徵。陳垣、陳寅恪等人治史固有針對外侮（強權佔領租借地、日本侵華事端乃至扶植滿洲國等），而於史學撰述當中鼓吹民族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中國境內出土文物淪於帝國強權之手，甚至大批運往國外，對學術工作者而言，此一文物浩劫亦等同於民族屈辱。1930年6月，在〈陳垣燉煌劫餘錄序〉一文當中，陳寅恪說道：

或曰：燉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其發見之佳品，不流入於異國，即秘藏於私家。茲國有之八千餘軸，蓋當時唾棄之賸餘，精華已去，糟粕空存，則此殘篇故紙，未必實有繫於學術之輕重者在。今日之編斯錄也，不

⁴⁹ 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77。

⁵⁰ 關於晚清民國以來經學、史學之學術位置消長變化，可參見羅志田：〈清季民初經學的邊緣化與史學的走向中心〉、〈「新宋學」與民初考據史學〉的分析。二文俱收入《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302-375。

過聊以寄其憤慨之思耳！⁵¹

雖然此文肯定：「則吾國有之八千餘軸，比於異國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讓焉。⁵²」陳寅恪且就陳垣治敦煌學有成，進而鼓勵學人亦能做「預流」以襄進世界之學術，然而所言時人對於民族文化史料流於異邦之「傷心」、「憤慨」，亦可見民國以來學術研究背後的民族情懷表現。

無獨有偶的，與陳寅恪同為清華同事，亦為散文創作健將的朱自清，在〈論誦讀〉一文中，就特別歸納總結在白話文學運動推動以來，以及在對日抗戰八年結束後，「朗誦」這一文學「聲情」的表現差異：

抗戰以來大家提倡朗誦，特別提倡誦詩。這種詩歌朗誦，戰前就有人提倡。那時似乎是注重詩歌的音節試驗，是要試驗白話詩是否也有音樂性。是否也可以悅耳。……戰後的詩歌朗誦運動比戰前擴大得多，目的也擴大得多。這時期注重的是詩歌的宣傳作用、教育作用，也許尤其是團結作用。這是帶有政治性的。而這種朗誦，邊誦邊表情，邊動作，又是帶有戲劇性的。這實在是將詩歌戲劇化。⁵³

從戰前的「文學性」的音樂嘗試，到戰後的「政治性」宣傳、教育作用，這期間的轉變，可以看出抗日戰爭時期團結民心，「朗誦」這一聲情的表達，對於傳達思想意念的輔助效應，比起純粹的「說」，其攝受聽眾的感染力顯然大的許多。朱自清這裡談的雖然是詩歌，但文章同樣具有聲情傳達的感染力，尤其涉及到學校教學方面，朱自清說道：

朗誦的發展可以幫助白話詩文的教學，也可以幫助白話詩文的上口，促進「文學的國語」成長。但是兩個時期的朗誦運動，都並不以語文教學為目標：語文教學實際上也還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現在魏建功先生，還有黎錦熙先生，都在提倡誦讀教學，……黎先生提倡的誦讀教學，據報上他的

⁵¹ 陳寅恪：〈陳垣燉煌劫餘錄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67。

⁵² 陳寅恪：〈陳垣燉煌劫餘錄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67-268。

⁵³ 朱自清：〈論誦讀〉，《東南評論》新1卷第7期，1947年，頁337。

談話，似乎注重白話；魏先生的座談，卻包括文言。這種誦讀教學自然是
以文為主，不以詩為主；因為教材是文多，習作也是文多，應用題是文
多。這就和朗誦運動的出發點不一樣。誦讀是一種教學過程，目的在培養
學生的了解和寫作能力。……朗誦是藝術，聽眾在欣賞藝術。誦讀是教
學，讀者和聽者在練習技能。這兩件事目的原不一樣。⁵⁴

朱自清〈論誦讀〉一文的寫作，緣起於魏建功（1901-1980）舉辦了「中國語文誦
讀方法座談會」，參加者約三十人，而朱自清也在受邀行列。文中特別提到魏建
功在座談會中認為「誦讀教學自然是以為主，不以詩為主；因為教材是文多，
習作也是文多，應用題是文多」，而文章的誦讀是在培養學生「了解和寫作能力」。
寫作技能的練習及能力的提升，「誦讀」在其中都可以扮演推波助瀾的效果，這與
「朗誦」純粹作為欣賞的角度是大為不同。魏建功是靜芝先生在北平輔大讀書時
候的系上老師，在輔仁受學習文的過程之中，靜芝先生於「誦讀」方面所受到的
訓練可以看出相當的紮實，對於其後來在臺灣輔仁大學中文系掌管系務，推動相
關古文課程，以及誦讀、寫作並行之教學來說，北平輔仁時期的啟發是顯而易見
的。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四、結語

靜芝先生關於家庭背景、成學過程及人事閱歷之撰述，或於「書」與「不書」
之間，有其隱曲及道德評判，此或亦可與春秋史筆鈞稽接榫。而隨著解嚴及兩岸
交流開放，晚年靜芝先生的追述，較之早年迫於國共對峙，兩岸分治的顧慮，不
同時期的書寫，顯然也有值得參照玩味之處。在為文能力的養成中，靜芝先生追
憶往事，有感於大一國文老師柴德賡（青峰）先生的教導，一生受用不盡；但也
惋惜其親共的錯誤選擇。柴德賡一生不僅治史有成，且精於詩詞，擅長書法，與
臺靜農先生在 1930 年代北平輔仁，以及抗戰後期 1944 年末的四川白沙國立女子
師範學院，都曾共事過。相較於此，另一國立女子師範學院的同仁，在 1949 年後
擔任胡風集團舵手的左翼文學作家方管（舒蕪，1922-2009），曾經形容摯友柴德
賡說道：「青峰多才多藝，吟詩之外，寫得一筆好字，是二王一路。啓元白先生

⁵⁴ 朱自清：〈論誦讀〉，頁 337。

和他是同門好友，都是陳援庵（垣）先生的高足弟子，……青峰做得一手很像樣的放翁一路的詩，寫得一手很像樣的二王一路的字」⁵⁵作為柴德賡學生的靜芝先生，詩、書、畫皆能探得箇中三昧，而書法宗二王，於古詩亦鍾情於放翁，多所摘錄其中詩句提寫書法作品。劉迺中先生曾提及靜芝先生最喜讀陸放翁詩，當年在北平輔仁大學的畢業論文題目就是《論陸放翁詩》，靜芝先生也曾選取放翁詩句請劉迺中治印，來臺後靜芝先生亦曾於 1970 年撰寫長篇論文〈劍南詩稿族友考〉。由以上所引友朋談話及史料呈現來看，不論二王書法以及放翁詩作，靜芝先生其心之所嚮及創作風格正與柴德賡完全吻合。柴德賡先生字「青峰」，靜芝先生晚號「龍壑」。「青峰」、「龍壑」相互輝映成趣，師生「游於藝」的共同領略，其間文史翰墨因緣，可為兩人生命及學術歷程憑添一段佳話。

徵引文獻

(一) 專書



王靜芝：《王靜芝教授譜傳別錄》，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 年。

王靜芝：《王靜芝散文集》，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 年。

王靜芝：《王靜芝學術論文集（上）》，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3 年。

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九·一八事變》，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

卞孝萱等編：《民國人物碑傳集》，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 年。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北京輔仁大學校史（1925-1952）》，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5 年。

周振甫：《周振甫文集·文章例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 年。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

⁵⁵ 舒蕪：〈天荒地老憶青峰〉，《隨筆》1988 年第 6 期。內文除提到自己與臺靜農、柴德賡深切的交誼及記載彼此唱和的詩歌，同時擺有三人加上歷史系羅志甫的合照。文中說道：「在女師學院的那幾年，我是抓緊一切機會，向同事的前輩如臺靜農先生等好好學習，也抓緊一切機會向老長兄們學習，其中因貼鄰而居，於朝夕相聚中承教最多的一位老長兄，便是青峰。」此外，舒蕪曾寫過〈憶臺靜農先生〉一文，收在《新文學史料》1991 年第 2 期上。

- 陳湛綺編輯：《民國珍稀短刊斷刊（18）北京卷七》，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製中心出版、新華書店發行，2006年。
-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陳垣編選、陳智超導讀：《大一國文讀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
- 張研、孫燕京主編：《民國史料叢刊：文教·高等教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
- 劉大櫆：《論文偶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二）報刊雜誌及期刊論文

- 王大安：〈惜有限之光陰讀有用之書籍說〉，《輔仁生活》第6期，1940年。
- 朱自清：〈論誦讀〉，《東南評論》新1卷第7期，1947年。
- 來新夏：〈說說「大一國文」——兼說《論孟一編》〉，《人民日報》，2013年10月5日。
- 高群：〈撫順市檔案局（館）與瀋陽市大東區圖書館互贈民國奉天政要王鏡寰史料〉，《蘭台世界》第22期，2012年。
- 陳子展：〈文言—白話—大眾語〉，《申報·自由談》，1934年6月18日。
- 陳望道：〈關於大眾語文學的建設〉，《申報·自由談》，1934年6月19日。
- 陳柱尊：〈論教授國文宜注重熟讀〉，《大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40年。
- 陶知行：〈大眾語文運動之路〉，《申報·自由談》，1934年7月4日。
- 無名子：〈孔教發微〉，《大道月刊》第1卷第2期，1933年。
- 舒蕪：〈天荒地老憶青峰〉，《隨筆》第6期，1988年。
- 舒蕪：〈憶臺靜農先生〉，《新文學史料》第2期，1991年。
- 趙蔭棠：〈賣書記〉，《文藝世紀》（冬季號）第1卷第2期，1945年。
- 趙英：〈「以文會友」——輔大生活雜寫之一〉，《輔仁生活》第1期，1939年。
- 劉迺中：〈回憶啟功先生〉，《中國書法》第16期，2015年。

（三）網路文獻

- 王寶林：〈藝苑雙峰並立兩岸翰墨奇緣——書法篆刻家劉迺中與臺灣書畫家王靜芝的翰墨奇緣〉，《書法報》「蘭亭版」，2002年3月。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312b10100ejdt.html。

王寶林：〈松風明月總情多——懷念臺灣學者書畫家王靜芝教授〉，2012年9月17日。網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312b10102dz9w.html。



